

◎馬興榮 著

馬興榮詞學論稿

〔下〕



在中國詩歌史上，詞以它特有的藝術形式和豐富多彩的表現方法，從不同的角度，反映了眾多詞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情趣，反映了唐五代以後各個時代千姿萬態的風貌和時代精神，給當時和後世的人們以一定的教益和美的享受，成為我國優秀的詩歌遺產中珍貴的一部分。

隨着詞的發展、興盛，人們很早就注意對詞學的研究了。宋元明清每個時代都有人注意這方面的工作。到清末，詞學更為盛行，王鵬運等人對詞的整理、補佚、校勘、考訂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先後印行的詞集有王鵬運的《四印齋所刻詞》，江標的《宋元名家詞》、吳重熹的《山谷人詞》等，它們使許多難得的資料得以保存、流傳，是有貢獻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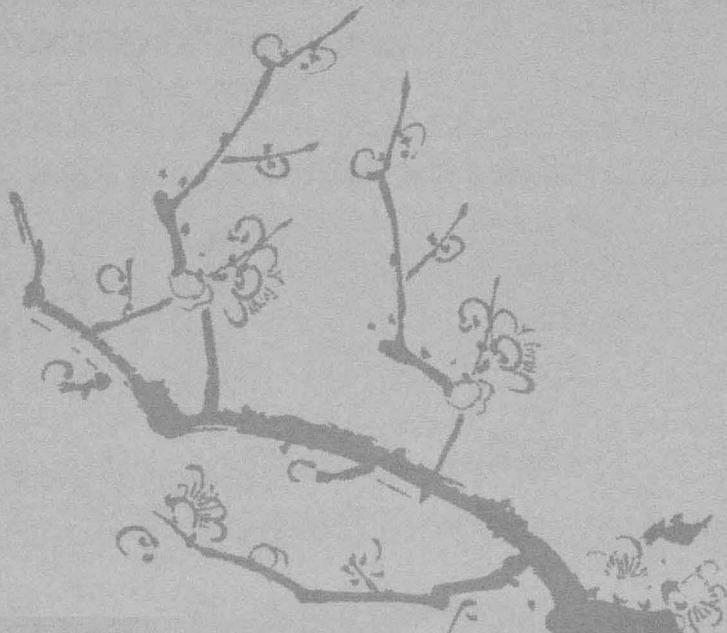
◎馬興榮 著

馬興榮詞學論稿



〔下〕

第四輯 札記



讀詞札記（一）

一、張炎《詞源》及其音樂觀

南宋張炎的《詞源》是宋代詞樂的總結，也是宋代詞人審美情趣的總結。許增說：“叔夏所著《詞源》二卷，窮聲律之音妙，啓來學之準範，為填詞家不可少之書。”^①秦恩復《詞源跋》更說是“倚聲家之指南也”。但《詞源》從元仁宗延祐年間書成後大約未曾刊行，故乾隆時江昱在《山中白雲詞疏證·陸文圭序》後加的按語中說：“《詞源》未見其書。”到嘉慶時秦恩復據元善起齋鈔本刊行，這是《詞源》最早的刊本。民國十九年，蔡楨作《詞源疏證》，這是《詞源》最早的注釋本。一九六三年夏承燾作《詞源注》只限於選錄有關詞的理論批評部分。一九九〇年浙江鄭孟津積三十年之功而成《詞源解箋》則是對《詞源》中有關音樂部分的音譜、圖像、敘訣和疑難文字等的箋證。夏、鄭兩注本相合，則是繼《詞源疏證》後《詞源》的一個完整新注本。

《詞源》上卷“五音相生”節中說：

官屬土，君之象，為信。

商屬金，臣之象，為義。

角屬木，民之象，為仁。

徵屬火，事之象，為禮。

羽屬水，物之象，為智。

① 見《詞話叢編》第一冊《詞源附錄》。

“律呂隔八相生圖”中說：

黃鐘，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。
 太簇，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。
 姑洗，所以修潔百物，考神納賓也。
 蕤賓，所以安靖神人，獻酬交酢也。
 夷則，所以詠歌九則，平民無二也。
 無射，所以宣佈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軌儀也。
 大呂，助宣物也。

這和先秦時期儒家所謂“樂者，通倫理者也”^①，唐代白居易論音樂作用的“作忠興孝”、“合敬同愛”^②，宋代沈括談音樂時說的“樂六變則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禮，……八變則地祇皆出，可得而禮。……九變則人鬼可得禮。……”^③等，是一脈相承的。張炎音樂思想深受儒家影響由此可見。

《詞源》上卷所列八十四調調名，在每一調名下逐一列出唐宋俗樂所用名（即“俗名”），並且還列舉了管色。但是，它和唐宋其他書籍論樂律所記往往不一致，如《詞源》云：

夾鐘商 俗名 雙調。

而《樂府雜錄》則云：

商七調，第四運雙調。

《唐會要》云：

① 《禮記·樂記》。
 ② 白居易《策林》六十四《復樂古器古曲》。
 ③ 沈括《夢溪筆談》。

仲呂商時號商調。

《補筆談》云：

仲呂商今爲雙調，殺聲用上字。

又如《詞源》云：

仲呂羽 俗名 正平調。

而《唐會要》則云：

林鐘羽時號平調。

這主要是由於唐宋樂律絕對音高有差異所造成的，其實並無差異，如前例，因爲《唐會要》採用的是“均調名”，它的“林鐘羽”正是《詞源》所記的“仲呂羽”。

《詞源》下卷“雜論”中第一句就說：“詞之作必須合律。”可見張炎是強調詞必須合律的。但是，他在“雜論”中又說：“音律所當參究，詞章先宜精思。俟語句妥溜，然後正之音譜，二者得兼，則可造極玄之域。”可見，他同樣強調詞的文學性，強調“二者得兼”才是好作品，這和姜白石說的“予頗喜自製曲，初率意爲長短句，然後協以律”^①類似。這和當時一些死抱住音律填詞的人不一樣，張炎顯然是既重音律，又重視詞的文學性，不把詞視爲音樂的附屬物。

二、《御選歷代詩餘》有失誤

《御選歷代詩餘》簡稱《歷代詩餘》，清康熙時沈辰垣、王奕清等奉敕編纂。全書共一百二十卷，其中“詞選”一百卷，“詞人姓氏”十卷，“詞話”十卷。“詞選”選錄唐代至明代詞一千五百四十調，九千零九首詞。據該書的“凡例”講它的選詞標準是：“錄其風華典麗而不失於正者爲準式，其沉鬱排宕、寄託深遠、

^① 姜白石《長亭怨慢序》。

不涉綺靡、卓然名家者尤多收錄。”又說它“廣搜名作，注明各體，故不另立圖譜。”所以它的編排原則是，分調收詞，以字之多寡為次，每調中以詞人時代先後為序。至於所選詞人爵里姓氏，也依時代為序，匯載於“詞人姓氏”。所選詞“有因事而流傳為詞話者”亦按時代順序別錄於“詞話”。三百年來，這部《御選歷代詩餘》影響不小，近年還重新影印發行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對於這部官書也評價很高，說它：“凡柳、周婉麗之音，蘇、辛奇恣之格，兼收兩派，不主一隅。考求爵里可以為論世之資，辨證妍媸可以為倚聲之律者，尤極精詳。自有詞選以來可云集其大成矣。”但是，清末民初的陳匪石對這部官書則持批評的態度，他說此書“編纂初意，原欲兼譜律而一之，然以此之故，遂有缺點。《九張機》本為九首，且有次第，如選詞則不可缺一，而此以備體之故，只錄第一首。又所據本有奪文，致少一字，則另列於字數相同之卷。例如清真《解連環》‘謾記得當日音書’句奪一‘謾’字，乃有百零五字之體；夢窗《風入松》‘玉佩冷丁東’句奪一‘佩’字，乃有七十五字之體。如此之類，觸目皆是。蓋當時既無善本可校，而編者又草率從事……是官書不可信之處，今之治詞者多知之矣。至於圖卷帙之多而抉擇不精，且遍收名人之作，則皆編者無專門之學，不足以舉之也。”^①上述陳匪石的意見是正確的，但是這部官書的錯誤遠不止此。首先，我認為它選人、選詞不當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說它是柳、周、蘇、辛兼收，是集大成的。其實，這部官書選人、選詞是有嚴格標準的，那就是對清王朝的統治是不是有利。有利就選，有害或者說有妨礙的就不選。如宋代的胡銓、陳人傑、文天祥及明末的夏完淳等人就沒有入選。有些人雖然入選了，但是他們被公認的某些代表作，不符合這部官書的標準，也不入選。如陳亮入選了，他的詞被選入十首，但是就不選他的《水調歌頭》（不見南師久）、《滿江紅》（曾洗乾坤）、《念奴嬌》（危樓還望）、《賀新郎》（離亂從頭說）。又如張元幹入選了，他的詞被選入四十四首之多，但就是沒有著名的《賀新郎》（曳杖危樓去）、《夢繞神州路》及《石州慢》（雨急雲飛）。再如著名詞人陸游入選了，他的詞被選入六十首，可以說是不少了，但是像《秋波媚·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》、《夜游宮·記夢寄師伯渾》、《訴衷情》（當年萬里覓封侯）這些詞作就沒有入選。更明顯的例子是岳飛，他被選入了，但不選他著名於世的《滿江紅》（怒

^① 陳匪石《聲執》卷下。

髮衝冠），只選他的《小重山》（昨夜寒蛩不住鳴）。這樣的例子在這部官書裏是舉不勝舉的。

其次，從編排來說，這部官書選入的詞人按時代先後排列，次序比較清楚，但同一詞人被選入的同調詞的排列就比較混亂了。例如卷八選了蘇軾六首《減字木蘭花》，他排列的先後次序是：《減字木蘭花》（閩溪珍獻）、（雙龍對起）、（曉來風細）、（春牛春杖）、（玉房金蕊）、（神閒氣定）。既不是按詞的內容，也不是按詞的寫作年代來排列的，隨意性很強。

再其次，這部官書“詞人姓氏”部分的錯誤也不少，如卷一百一的《張泌傳》：

張泌，一作佖，字子澄，淮南人。初官句容尉，上書陳治道，後主徵爲監察御史。歷考功員外郎，進中書舍人，改內史舍人。隨煜歸宋，仍入史館，遷郎中。歸，寓家毘陵，有集一卷。

編者顯然是把南唐的張泌和《花間集》中的張泌混爲一個人了。按，《花間集》成書在後蜀孟昶廣政三年（九四〇），李後主時年僅四歲。李後主繼爲南唐國主是宋太祖建隆二年（九六一），這時《花間集》已成書二十餘年矣。顯而易見《花間集》中的張泌是前蜀舍人，與若干年後南唐李後主屬下的內史舍人張泌是兩個人。而《御選歷代詩餘·詞人》把南唐張泌的生平事蹟硬加在《花間集》中張泌的頭上去了。這一錯誤一直沒有更正，因此許多人都據之爲說，貽誤非淺。

再其次，這部官書所載的“詞話”也和“詞人姓氏”部分一樣，錯誤不少。這一點唐圭璋在《讀詞三記》的《引書須用原始材料》、《歷代詩餘多誤不可引用》兩條中已經舉例說明了。我這裏再舉一條大家都常引用並據以爲說的，其實是錯誤的例子。《御選歷代詩餘》卷一百十五《詞話》引陸游語云：

世言東坡不能歌，故所作樂府多不協律。晁以道謂：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，東坡酒酣，自歌《陽關曲》，則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。試取東坡諸詞歌之，曲終，覺天風海雨逼人。

按，此條世人引以論蘇詞最多。但仔細一查陸游原作，就發現不是這回事了。是這部官書的編者利用陸游的兩段文字拼湊而成的，而且與陸游原意有較大出入。現在把陸游被利用的兩段原文抄錄在下面，讀者一看就明白了。

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（據光緒三年湖北崇文書局本）卷五：

世言東坡不能歌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。晁以道云：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，東坡酒酣，自歌古《陽關》。則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。

陸游《渭南文集》（據四部叢刊初編本）卷二十八《跋東坡七夕詞後》：

昔人作七夕詩，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，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。歌之曲終，覺天風海雨逼人。學詩者當以是求之。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。

陸游是說歌東坡七夕詩“曲終，覺天風海雨遣人”，而《御選歷代詩餘》的編者却把它改成“試取東坡諸詞歌之，曲終，覺天風海雨逼人”。由此可見，這部官書的“詞話”，儘管列出了作者名或書名，但仍不可信，要引用須查對原文。

《御選歷代詩餘》自清康熙四十六年（一七〇七）編成至今，已流傳二百八十多年了，它對清詞的發展，詞的研究，影響不小，而它的種種謬誤，注意及之者甚少，故繼唐圭璋先生之後，再舉例論之，希詞學研究者注意焉。

三、江昱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的得失

張炎《山中白雲詞》的版本有多種^①，而為《山中白雲詞》疏證的只有乾隆十八年（一七五三）刊行的江昱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一種。江昱字賓谷，號松泉，江蘇儀徵人。工詞，有《梅鶴詞》四卷，集外詞一卷，考證《蘋洲漁笛譜》二卷，疏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。他認為：“詞自白石後，惟玉田不愧大宗，而用意之密，適肖題分，尤稱極詣，率爾讀之，雖擊節歎賞，而作者苦心或未出

^① 見吳則虞校輯《山中白雲詞》附《玉田版本述畧》及唐圭璋《宋詞版本考》。

也。……間與弟蔗畦涉獵之餘，遇可相發明者，輒筆之簡端，垂二十年，繙書不下萬卷，蓋已得十之七八。……爰加節葺，列於詞之左，鄙見則以‘昱按’二字別之。”^①按，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：

原序七篇 “注”一條，“按”七條。

卷一 “注”十九條，“按”九條。

卷二 “注”十四條，“按”十一條。

卷三 “注”十一條，“按”十五條。

卷四 “注”十二條，“按”十一條。

卷五 “注”十三條，“按”十條。

卷六 “注”四條，“按”五條。

卷七 “注”六條，“按”五條。

卷八 “注”五條，“按”九條。

附錄 “注”一條，“按”一條。

以上共計“注”八十六條，“按”八十三條。共計一百六十九條。

這一百六十九條“注”、“按”，對《山中白雲詞》所收詞的寫作年代及詞中的人名、地名、詞的主題、版本錯誤、前人誤解等等作了闡釋，引證豐富，態度謹嚴，對讀《山中白雲詞》的人頗有幫助。如卷二《臺城路·游北山寺》後引《嘉靖寧波府志》、《雪竇寺志》、《成化四明郡志》、《續燈正統》等，詳細注了雪竇山、雪竇寺及雪竇野翁炳同禪師、東巖靜日禪師。真是有根有據。查四印齋本《山中白雲詞》此闋題目正作《雪竇寺訪同翁東巖》。又如《徵招·聽袁伯長琴》後引《元史·袁桷傳》及戴表元《剡源集·送袁伯長赴麗澤序》注“袁伯長”。江昱按則引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中之《琴述贈黃依然》及《示羅道士》等證明彈琴為袁桷所擅長。同時也更進一步證明了“袁伯長”即袁桷，可以說注和按均正確無誤。再如《山中白雲詞》龔翔麟序云：“若舒序所稱北游燕薊，蓋在少壯時，迨至元庚辰始返江南，而年已四十餘矣。”江昱按云：“玉田以至元庚寅入都，辛卯南還，留北未久。此序北游燕薊，蓋在少壯時，迨至元庚寅始有江南之語，蓋緣

^① 江昱《山中白雲詞疏證序》。

《臺城路》詞庚辰之北，辰字之誤。”糾正龔序之誤，甚是。對於不清楚而又沒有證據證明的，江昱也不妄下判斷。例如卷七《風入松·閏元宵》：江昱按云：“元史：世祖至元五年、成宗大德十年、仁宗延祐四年俱閏正月，此詞未知何時所作。”態度是很認真的。

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中的注和按，錯誤也不少見。例如卷二《瑤臺聚八仙·爲野舟賦》，江昱在引薩天錫詩《雪霧過清溪題道士江野舟》詩後按云：“倪瓈《清閟閣全集》亦有野舟，……考以時代，云林後於玉田，則此野舟玉田不及見可知，故以薩集所指野舟爲近。”查張炎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（一二四八），大約卒於元英宗至治元年（一三二一）前後。倪瓈生於元成宗大德五年（一三〇一），卒於明太祖洪武七年（一三七四），確實是後於玉田。張炎不及見倪瓈詩是很可能的。但薩天錫約生於元大德九年（一三〇五），約卒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（一三五五），更晚生於倪瓈四年，張炎又怎麼能見到他的詩呢？由此可見，江昱的這條按語是錯誤的。又如卷八《臨江仙·甲寅秋寓吳，作墨水仙爲處梅吟邊清翫。時余年六十有七……》江昱按云：“甲寅，元仁宗延祐九年。”查元仁宗延祐祇有七年，即一三一四——一三二〇年，無“九年”，又查張炎六十七歲乃元仁宗延祐元年（一三一四），是知“九”爲“元”字之誤。再如卷一《滿庭芳·小春》，江昱按云：“此詞似以小春喻元朝也。”所謂“小春”，據陳元靚《歲時廣記》卷三十七引《初學記》云：“冬月之陽，萬物歸之。以其溫暖如春，故謂之小春，亦云小陽春。”從這首詞的內容來看：上片寫小春天氣轉暖以及自己的心情。下片寫小春天氣不能持久，小春之後不久就是風雪嚴寒。如果照江昱按語說的“以小春喻元朝”，那未免失之空泛。我的意見是：這首詞大約作於元仁宗延祐二年（一三一五），這年，元蒙統治者爲了籠絡士人，恢復了停止近四十年的科舉，舉行會試、廷試，取中進士五十六人。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，從七流官致仕，六十以上授府、州教授，餘授山長、學正，並增國子生一百名。這在當時來說，條件算是相當優厚，因此，許多士人認爲是春天來臨了，都躍躍欲試。所以張炎寫這首詞藉以告誡這些士人，不要誤把小春當陽春，要注意小春之後就是嚴寒。

實事求是地說，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中有些注和按的錯誤，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所造成的。例如江昱在仇遠序後按云：“玉田所著《樂府指迷》，議論精到，誠度世之金針，但祇二十餘則，爲卷十數繙而已，且有訛闕，無善本可校，惜

哉。”在陸文圭序後按云：“《詞源》未見其書，今所傳《樂府指迷》，首篇題曰《詞源》，其餘如子方所稱，約畧多有，特殘缺僅存，無上、下卷之多耳，或當時亦名《詞源》未可知也。”許增《榆園叢刻》云：“叔夏所著《詞源》二卷，……陳眉公續秘笈，僅載下卷，以《樂府指迷》標題。《四庫存目》仍其名。中間帝虎陶陰，指不勝屈。”^①由此可見，江昱上述兩條按語的錯誤，是由於當時祇見到被明代陳繼儒改竄的《詞源》，沒有見到真正的《詞源》，所以把《樂府指迷》說成是張炎所著，又懷疑《樂府指迷》可能是又名《詞源》。這都是由於條件限制所造成的，不能責怪江昱。

四、說壽詞

壽詞從壽詩發展而來，最早寫壽詞的是北宋的韋驥（一〇三三——一〇五），他寫有《醉蓬萊·廷評慶壽》。其後有王觀（宋仁宗、宋神宗時在世）的《減字木蘭花·壽女婿》，晁端禮（一〇四六——一一三）的《慶壽光》，米芾（一〇五一——一〇九）的《訴衷情·獻汲公相國壽》、《鵲鵠天·獻汲公相國壽》、《浪淘沙·祝壽》等等。到南宋時，作壽詞的詞人更多，陳亮、朱敦儒、周紫芝、向子堙、李彌遠，張元幹、趙彥端、范成大、陸游、張孝祥、辛棄疾、楊炎正、高觀國、劉過、劉克莊、劉辰翁等人都寫有壽詞。金、元、明、清歷代詞人寫壽詞的也不少。

壽詞中以祝他人壽者為多，代人壽者、自壽者有，但極少。

壽詞大都是歌功頌德、祝願長壽多福之類的應酬之作，確實無甚價值。但也不能一律而論，壽詞在南宋時就明顯地有了變化，有的詞人往往藉以表達自己的政見，主張。如辛棄疾的《水龍吟·甲辰歲壽韓南潤尚書》：

渡江天馬南來，幾人真是經綸手？長安父老，新亭風景，可憐依舊。夷甫諸人，神州陸沉，幾曾回首？算平戎萬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，公知否？況有文章山斗，對桐陰、滿庭清晝。當年墮地，而今試看，風雲奔走。綠野風煙，平泉草木，東山歌酒。待他年，整頓乾坤事了，為先生壽。

^① 見《詞話叢編》第一冊《詞源附錄》。

韓南澗即韓元吉，曾任吏部尚書，是著名的主戰派，這時退居上饒。辛棄疾也被彈劾罷官居上饒，兩人過從甚密。這首詞的上片指斥南宋小朝廷及一般士大夫苟且偷安，不思恢復中原。結尾四句提出驅逐金人，收復中原，統一全國，是讀書人應有的作爲。這是對韓元吉的期望，也是自許。下片談韓元吉有學問，出身名門，輔佐君王抗金。現在退居山林，以歌酒自娛，不乏高尚情趣。這是對韓元吉的稱頌，也是進一步鼓勵韓元吉要不忘讀書人的責任。結拍雖說是預期再爲韓元吉祝壽，但目標仍是收復中原，統一全國。整首詞縱論國家大事，斥責投降派，洋溢着愛國激情。又如被稱爲辛派詞人的劉過，在當權者韓侂胄決定出兵北伐時，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，借祝賀韓侂胄壽誕寫下了《西江月》（堂上謀臣尊俎）這首壽詞，表達了當時愛國志士北伐抗金，收復失地，統一全國的共同願望。再如被清代張德瀛評爲“本朝詞家領袖”^①的吳偉業，也寫了一些壽詞，有的壽詞也寄寓着一些感慨。如《木蘭花慢·壽嘉定趙侍御》下片中的：“歎干戈滿地飄蓬，落日數歸鴻。”《木蘭花慢·壽汲古閣主人毛子晉》下片中的：“卧荒江投老遺民，兵後海田耕。”《風流子·爲鹿城李三一壽》下片中的：“登高頻回首，江南舊恨在，鐵笛滄浪。十載故園兵火，三徑都荒。”我們從中多少可以看出些像吳偉業這樣遺民的生活、思想感情。

總之，我認爲對壽詞不能一律而論，一概斥之爲應酬之作，應該從詞的實際出發。

（原載《楚雄師專學報》[社會科學版]一九九四年第一期）

^① 《詞徵》卷六。

讀詞札記(二)

一、集句詞

宋代的王安石以寫集句詩著名，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三十五引《遯齋閒覽》云：“荆公集句詩，雖累數十韻，皆頃刻而就，詞意相屬，如出諸己，他人極力效之，終不及也。”王安石不但寫集句詩，還第一個寫集句詞。今傳龍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就有一卷集句詩，一卷集句歌曲。

王安石的集句詞和他的集句詩一樣，渾然天成，“如出諸己”。如他的《菩薩蠻》：

數家茅屋閒臨水，單衫短帽垂楊裏。
今日是何朝，看予度石橋。
稍稍新月偃，午醉醒來晚。何物最關情，黃鸝三兩聲。

整首詞寫鍾山草堂優美雅靜的居住環境和自己閒適自得的生活。但下片中的“何物最關情，黃鸝三兩聲”，如果和他的改革抱負以及被罷官的遭遇聯繫起來考慮，那就似乎隱含着許多感慨了。這和他晚年所寫的許多小詩極為類似。

這首詞如果我們不說明它是集句詞，如果不指出那一句是出自那個詩人，那就一點也不覺得它是拼湊前人詩句而成的了，這正是這首詞成功之處。同時也證明王安石的集句詞的確和他的集句詩一樣不一般。

在王安石的影響下，蘇軾、黃庭堅等人也寫過集句詞，但即使是學富才高的蘇軾，如他所寫的《南鄉子》：

悵望送春杯(杜牧),漸老逢春能幾回(杜甫)。花滿楚城愁遠別
(許渾),傷懷,何況清絲急管催(劉禹錫)。吟斷望鄉臺(李商
隱),萬里歸心獨上來(許渾)。景物登臨閒始見(杜牧),徘徊,一寸
相思一寸灰(李商隱)。

在蘇詞中也是平平之作,原因是它受的限制太多,不容易把握,要做到渾然天成,是比較難的。但是,直到清代,喜歡寫集句詞的人也還有,例如朱竹垞、王士禛、董以寧就是比較著名的。晚清詞人劉彥清《鷗夢詞》中載有專集李長吉詩句而成的《菩薩蠻》四闋,現舉兩闋於下為例:

落花起作迴風舞,桂郎謝女眠何處。燕語踏簾鉤,羅緯午夜
愁。
行雲愁半嶺,路重塗泥冷。星盡四方高,飛絲送百勞。
濃蛾疊柳香唇醉,玉釵落處無聲膩。酒色上來遲,愁紅獨自
垂。
春風吹鬢影,小樹開朝徑。骨出似飛龍,宵寒藥氣濃。

清人不但集前人多家詩或一家詩為詞,也有集前人多家詞句為詞的,如董元愷《蒼梧詞》中的《更漏子·闌夜》:

晚妝殘(李後主),春意淺(和凝)。遠岫參差迷眼(顧夐)。千萬
恨(溫庭筠),在心頭(馮延巳),秋波橫欲流(李後主)。
燕雙雙(溫庭筠),人悄悄(尹鶴)。殘月光沉樹杪(和凝)。煙霧冷(魏成
班),畫屏幽(毛熙震)。吳山點點愁(白居易)。

不管是集前人詩句為詞,或集前人詞句為詞,其湊合的痕迹都比較明顯。可以說,自王安石創集句詞之後,還沒有出現過為衆人所稱道的佳作。

對於集句詞,清代鄒祇謨《遠志齋詞衷》云:“賀黃公云:生平不喜集句詩,以佳則僅一斑爛衣,不佳且百補破衲也。至詞則尤難神合。曩惟仲茅,今則文友、阮亭,稱為老手並驅,然此體正不必多作。”此言甚是,填詞應該是用自己活生生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活生生的感情才是正路。集句詞不過是文人游戲之作而已,是不宜提倡的。今人極少有寫集句詞者,這應該說是詞壇的一件大

好事。

二、朱熹詞

朱熹是著名的理學家，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，他不但重道輕文，甚至說：“道者文之根本，文者道之枝葉。惟其根本乎道，所以發於文皆道也。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，文便是道。”^①這就是說，他認為道、文是一體的了。但是朱熹的理論和實踐有不少矛盾之處，例如他說：“東坡文字明快，老蘇文雄渾盡有好處，如歐公、曾南豐、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。”^②這就是說，文辭技巧也是重要的，文辭技巧也不可不注意，這又把文和道割裂開了。又例如他說：“多言害道，絕不作詩。”^③但是他又說：“有不能無言者，亦未免以詩發之。”^④而且他自己既寫散文，又寫詩，并且詩、文都不乏佳作。同時他還寫詞，這大概和當時詞這種文學形式甚為流行的大環境分不開，當然他也有自己的看法，他在《答孫敬甫書》中說：“小詞，前輩亦有為之者，顧其詞義如何，若出於正，似無甚害。然能不作更好也。”這說明，他認為只要思想內容好，詞也可以作。這和淳熙七年（一一八〇）他將張祁、張孝祥父子的愛國詩詞刻於官署，並作題記云：“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父子詩詞以見屬者。讀之使人奮然有擒滅讐寇，掃清中原之意，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，以示文武吏士。”^⑤完全一致。同時他也重視詞的藝術性，並不僅僅是注意思想內容，他在《答陳同甫書》中說陳亮寄給他的兩首詞是“豪宕清婉，各極其趣”，就是證明。這和某些理學家利用詞來宣揚他們的主張不同，例如寫《竹齋詞》的沈瀛的《醉落魄》：

致知格物。初學工夫參聖域。天高地遠無窮極。欲造精微，莫若
守惟一。 純全天理明如日。都緣人欲來相惑。且將持敬為先入。
若能持敬，真箇是神力。

致知格物，孔顏學問從茲出。聖言句句皆真實。涵養功深，將見
自家得。 毋意毋我毋固必，視聽言動非禮勿。勝己之私之謂克。

^{①②} 《語類》卷一三九。

^③ 《次傅安道楊儀之勸農詩韻二首》序言。

^④ 《語類》卷一四〇

^⑤ 《書張伯和詩詞後》。